

市井生活

主编/宋群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

本地TM

市井生活

主编/宋群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 SK14N139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本地: 市井生活 / 宋群主编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9

ISBN 978-7-5613-7865-6

I. ①本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社会生活—概况—西安市—1980 ~ 1989 IV. ① K294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6061 号

本地: 市井生活

主 编 / 宋群

策划组稿 / 郭永新 宋 群 何理

责任编辑 / 王西莹

封面设计 / 宋 群
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(邮政编码 710062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/ 西安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15.5

插 页 / 4

字 数 / 180 千

版 次 /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13-7865-6

定 价 / 48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 (029) 85307864 85251046 (传真)

目录

- 001 宋群 _ 市井西安，一个人的城市记录
- 017 赵利文/图 _ 市井西安
- 图注文字 _ 宋群 何理 郭鑫 陈刚 高岩 角炮
- 145 花灵仙口述 _ 这几十年啊，感觉一晃就过去了
- 153 王兆才口述 _ 过日子不是件容易事儿
- 159 张世和口述 _ 在中国，我是第一个开民营书店的个体户
- 177 毋建国口述 _ 一座城市，不仅仅只有帝王将相史
- 193 宗鸣安 _ 老西安人的生活

市井西安，一个人的城市记录 _ 宋群 / 文

何为市井？“立市必四方，若造井之制，故曰市井。”长安，盛唐时，全城一百零八坊，坊为居，另设东市与西市，市为商，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”，极尽繁盛，再后来，岁月凋敝，夜路狂奔，长安一去不返，魂魄尽失，唯留躯壳，只余西安。“买东西”的说法，就是源自东市与西市，如今说法仍在，东西市，荡然无存；“坊间”与“街坊”的说法也在，坊却踪迹难寻。

经过半年筹备，我与何理策划的“本地－市井生活系列展”于2014年终于开展。展览分三部分，一部分是赵利文从事摄影以来第一个作品展《一个人的城市记录：西安1985—1995》；一部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老物件展，包括了书籍、信件和征集来的个人与家庭照片以及生活用品；另一部分是现场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音乐与影像。开展当天，馆内挤满了观众，面对如此热情，虽有准备，却也始料未及。

展品既然市井，形式就索性亲民，没有什么开幕式。斜挎书包好像超龄高中生的赵利文，走到观众面前时，也只说了一句话，鞠了一个躬。这个看起来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害羞的中年人，没有多少人知道他，更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促使他拍了如此众多的市井西安。

—

1985年，赵利文高中毕业，通过招工考试进了唐城宾馆，成为一名保安，那年，他十七岁。

能在酒店上班，当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。唐城宾馆新建不久，与老资格的几家酒店比，更新潮，收入也更高，小年轻刚上班不久，月工资也能拿到一百块，而当时国营单位干部的工资，才七十块，因此招个把人，上千人报名，并不稀奇。陕西古都艺术文化大厦招工，三天来了八千人，人山人海蔚为壮观，最后只能终止报名，成了新闻，上了报纸，有图为证，拍摄者恰好是赵利文。酒店吃香，究其根本，是门里门外，完全两个世界，进了门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，符合人们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所有想象；出了门，十里扬尘一地鸡毛，反差极大。平时该鞭挞鞭挞，该唾弃唾弃，但只要有机会，还是往里挤。

赵利文的家，在庆安厂，地处城西，那一片都是厂区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援华苏联专家做的设计，树高，路宽，一种特有的集体主义气息，夏天从树荫茂密的大庆路穿行，两边都是苏式建筑，会有一种置身莫斯科郊外的幻觉。当年建设时，有专家认为过于铺张，但今天得承认，苏联老大哥也算是有远见，这条通往城市西郊的道路，没怎么翻修，依然承担着主动脉的疏通作用，而城南北的几条干道，早已面目全非。

按当年的规划，东郊是军工与纺织城，西郊是电子城，南郊文教区，北郊仓库区，城市格局中规中矩，那会儿对西安的展望，是“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业城市”。在工人阶级还被尊称“工人老大哥”的时代，西安的城东与城西，确实有模有样，风头压过南郊与北郊，东郊纺织城一度还有“西安小香港”如此夸张的称谓。接近二十世纪末，城东与城西都走了下坡路，停产、倒闭、下岗，一路伴随。尤其纺织城，行走其间，树木依然遮天蔽日，厂房却空空荡荡，气象已衰，像剩了骨架的恐龙，形在，瓢没了。殷实人家的家道中落，总有无尽悲凉，国营大厂的心酸事，山西人贾樟柯拍过《二十四城记》，陕西人王全安拍过《纺织姑娘》。

赵利文的第一台相机，华山牌，他父亲送的，当年价格八十块，不便宜。他父亲是庆安厂宣传科的摄影干事，一辈子都在拍厂里的大事小事，或光荣榜上披红挂绿的模范，或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，赵利文耳濡目染，从小对摄影痴迷，也是一种宿命。

但是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拍照片这爱好，实在负担不起，而赵利文却越拍越上瘾，那台华山相机，已经力不从心，买台更好的家伙，成了他的心结。这想法一说，家里立即炸锅，就算支持他这爱好，但拿工资吃饭的家长，孩子这么“胡花钱”，谁也没法接受，双方面红耳赤，争执不下，最后的结果是，执意要买也行，以后结婚的钱，家里一分不出，没想到赵利文这个犟脾气，竟然一口答应，还白纸黑字的签了个“协议”，一台崭新的一千六百块钱的理光 10，就这样买回家了。

1985 年，赵利文开始拿着相机，走街穿巷。

二

2013 年的夏天，第一次见到赵利文，比实际岁数年轻，穿一件钓鱼背心，浑身兜，一顶户外帽，这种摄影爱好者造型，任何一个旅游地，都会撞见。高大，结实，走路风风火火，当年能进唐城宾馆当保安，估计这体格，起了决定作用，说话急，既憨厚，又现实，工厂子弟的劲儿，很足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走街串巷拍的照片，据他自己讲，有上万张，大多还在整理，在编校过程中看到的，只是五六百张，也就是说，还不足全部的十分之一，即便如此，也被这几百张丰富鲜活的记录惊着了，打动了，让我瞬间重回“这个感觉，真让我舒服，

它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”的那个年代。很多熟悉的街巷，本来只剩下名字，看到照片，都活了过来。树影悠长，夏日蝉鸣，又见旧时光。

西安的街巷，不乏立意高古的名字，尚德路，尚俭路，尚勤路，可敬不可爱，倒是这些：下马陵、端履门、五味十字、竹笆市、粉巷、木头市、骡马市、饮马池、东羊市，市井味浓，烟火气重。说来也怪，这些街巷，好像也是借了名字的光，自古至今，人气儿足，熙熙攘攘。

由照片可见，街巷生活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踪迹可寻，再后来，逐渐整齐划一，随着传统街区的减少，真正的街巷生活也日渐消亡。日本有位建筑师芦原义信，写过一本有关日本十七个传统老街区改造与再生过程的书，那些街区，与西安老城很多地方有几分相似，商住混杂，日渐衰败，街区犹如树木，有枝繁叶茂的时候，也有枯枝败叶的时候，调理得法，应该也会焕发生机。书中所举实例，就是遵循此道。按理说，日本土地私有，相互妥协，意见统一，本应更难，但却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，找到了一种平衡。经验虽不能照搬，至少有所借鉴。一个衰落的传统街区，只要真下力气去改变，很多事情，并非不能兼顾。

赵利文的照片里，很多场景，都是街坊邻里。其中有一张，几个孩子横躺竖卧，围在自来水池旁，周围还有小商店，这些孩子，看情形都是住在附近。这场景，立

即让人想起意大利古城随处可见的喷水池小广场，形式相近，意思一样，小伙伴们在这儿建立友谊，少男少女们在这儿发生爱情。只有多功能混杂的街区，才会有这样的地方。这场景，也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家住夏家什字，在西大街以南，周围都是老街坊，有事儿没事儿，就爱聚堆儿，大人们谰闲传，小孩儿们围着打闹。老街区的生活，是紧凑，上学买东西看电影，所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，都是步行就能解决。

当然，老街区也有它的问题，生活设施跟不上，拥堵。面对市井生活的复杂性，最快的解决手段，就是推倒重来，功能明确，整齐划一，但是，看似最有效率的办法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城市和植物一样，有时候，自然生长，才最有生命力。

盛唐时，坊与市四周，都筑有高墙，居住与商业，截然分开，与今天的城市规划，有些神似，商业区与住宅区，泾渭分明，晚上还实行宵禁，坊门与市门都四门紧闭。但是，随着商业日渐兴盛，坊与市之间，逐渐互渗，原来的格局，被逐渐打破。在唐时，以武力强制方式进行如此严苛的划分，尚且不能阻隔各自互通，足见城市自然生长的力量，根本拦不住。正如赵利文照片里所呈现的，街道边摆摊，家门口乘凉，家与城间的关系，互相渗透，此消彼长，既有生活智慧，也有处世哲学，喧闹、庞杂，活得就是人间烟火气，活得就是自然生长。

三

帕慕克（Orhan Pamuk）说“所谓不快乐，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”。那么快乐，一定是喜欢自己的城市，这真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。

在众多老照片中还原一个城市的过去，意义何在？我想，专业的城市研究者会发现，照片本身，就如同记忆的黑匣子，在照片人物的喜怒哀乐之下，有许多可以解读的信息，诸多细节所传递出的内容，还原出所在时代的生活形态，甚至是庞大的城市组织结构，因此，并非只是停留在照片所呈现的情绪上，更不只是怀旧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赵利文在新城广场混乱的人潮中拍照，头挨闷棍，缝了三针，回单位挨了批，保安也干不成了，给了个扫地的差事，算是惩戒，但也是从轻发落，因为与领导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加之唐城宾馆并无专业摄影师，一些重要来宾接待，日常的拍照任务，也都由他承担。赵利文津津乐道的，是当时的总书记视察西安，参观唐城宾馆，他受领导安排，冲在最前面拍照，因为离总书记太近，被随行的工作人员出手点了肋骨，“开始没感觉，回家后疼了一个星期。”后来，这张照片在报纸上发表了，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己拍照生涯里，挺重要的一张。

哪些稿能投，哪些不能，赵利文自己划了一根红线，这批市井生活的照片，他

感觉内容不够正面，因此，当时几乎没发表过。按他的话说“当时什么都不明朗，什么也不敢拿出来。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次严打，与他父亲同一科室的版画干事，被判入狱，罪名之一，就与拍照有关，事儿闹得很大，后来被枪毙。

照片难发，稿费也低，一张稿费也就两三块钱，赵利文拿最多的一次，是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二十五元。零散的稿费，解决不了胶卷钱，主要来源，还是从他父亲那儿蹭，还好，厂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，对胶卷管得也不怎么严。尽管发表的照片很少，大大咧咧的赵利文也并不注意保存，用心收集照片的，是他父亲。

对于儿子喜欢摄影，做父亲的其实内心很矛盾，一方面让儿子跟着自己的朋友、陕西画报社的潘科学习摄影，不断支持胶卷；另一方面，又觉得儿子不务正业，吊儿郎当，没个安稳的样子。尽管如此，只要儿子有照片发表，不管什么报纸，不管尺寸多小，他都认真地剪下来，还细心剪下带有日期的报头，附在旁边。赵利文也很清楚，谁是最支持他拍照的人。

四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安，最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，是“西影”（西安电影制片厂）。1984年，吴天明拍了《人生》，1987年又拍了《老井》，1988年张艺谋

拍了《红高粱》，“西影”火了，西安忽然成为了一个不断被叙述的城市，但对于西安人来说，这些跟他们没关系，居家过日子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才是大事儿。这个城市依旧沉闷、闭塞，年轻人都拼命地想离开这个城市，“立春一过，实际上城市里还没什么春天的迹象，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，它好像在一夜间变得温润潮湿起来，这样的风一吹过来，我就可想哭了，我知道我这是被自己感动了……”每当我看到有人提着行李离开这个城市，我就很羡慕他们。别管他们去哪……”顾长卫电影《立春》里的这些独白，任何一个当年试图逃离家乡的人，都会被触动。

赵利文有没有想过逃离这座城，不知道。1989年，他曾报考过北京的中国新闻学院，摄影进修专业，考试虽然通过，出不起学费，最终放弃。这一年，头负伤的赵利文，在唐城宾馆扫了三个月的地，被安排做了门迎，每天开门、提行李。上班做什么，其实他也不在意，因为酒店工作是三班倒，他能腾出时间走街串巷，这就行了。在街上混，除了胆量，还得有身份。那个年代，人们对拿照相机拍照的人，比较警惕，一旦被发现，他是能躲则躲，能跑则跑，实在躲不过跑不掉，被人拦下质问，能拿出来证明自己“身份”的，就是一些摄影协会会员证，他的这些证，说服力都很低，“工作单位”一栏里，不是“唐城宾馆”就是“远东机械制造公司”，而“职务职称”这一栏，写的是：“工人”。

想当一名摄影记者，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。不断拍，不断投稿，他希望能发表

的同时，还希望名字前能有“本报通讯员”这几个字，当然，这只能是个希望。一个没几个人知道的《区县经济报》，给了他一个通讯员证，没有“工作单位”这栏，“职务”这栏写的是：特约摄影通讯员，旁边写着：“此证供本报通讯员采访用，请有关单位提供方便并给予指导和协助”。有了这个证，赵利文在街上跑，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。

在唐城宾馆上班到了1990年，在厂里上了一辈子班的父亲，费尽周折四处求人，把赵利文安排进了远东公司军品所43车间，当了一名钳工，一份有指标的正式工作。让孩子有一个安稳可靠的去处，是那个年代所有做父母的都会做的一件事。远东公司也是兵工企业，原来与庆安厂是一家，都在城西，无论远东还是庆安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，福利区都是成片的苏式建筑，大家遵循同一种生活轨迹，上下班时间，穿着蓝灰色厂服的人群，会涌满整个宽阔的街道，望不到边。

平时拿着相机晃悠，又在酒店上过班，吊儿郎当的赵利文，已经不能老老实实在厂里待着，安心做一名钳工了。犟脾气一上来，又开始和家里人闹腾，想和曾经的摄影老师、陕西画报社的潘科一起“下海”，费这么大劲儿才安排好的正式工作不要，家里人当然无法接受，矛盾之激烈，可想而知，但赵利文横下一条心，反正是不想回厂里上班了。

和闹腾买相机一样，这次，赵利文又赢了。

五

西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，城中最生动的，是回坊。

北京人有胡同，上海人有里弄，西安人的市井生活，溯本求源，根子原本是坊。我们的《本地》，曾有一期《回坊》专辑，腰封上有一句：“没有回坊，西安就是一座死的古城”，很多人有意见，其实所谓生死，只指“古城”。回坊之所以“活着”，是其生活方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，依寺而居，依坊而商，这些从唐就开始大量定居在长安的穆斯林，一直沿袭着这种生活方式，从这个角度说，这完全是生活形态的活化石，迄今未变。

比照欧洲古城，去看西安古城，既痛心，又遗憾。虽为古城，却少有古建，唯有一圈明城墙，所幸完整。城外，所谓古，不过是陵墓，是残破寺庙，像意大利人、法国人那样，还生活在几百年前房子里的，也有，但寥寥无几。据说鲁迅曾为写小说《杨贵妃传》，来过一次西安，大失所望，留下了一句“想不到连天空都不是唐朝的”，抱憾而回，写作计划，就此作罢。民国西安，给鲁迅留下如此印象，足见所谓古城，早已不古。

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城中居民的生活，就像坊上美食“胡辣汤”，是各种生动有趣的混合，马车与汽车同行，自来水和挑井水并存，城内，甚至还有耕田菜地。西安，在外地人想象中，十三朝古城，大概人人温文尔雅，处处亭台楼阁，来了才发现，与想象差距甚远。西安，早已不是长安。别说外地人，本地人每每提及以前，总说那会儿房屋齐整，道路洁净，人也利索，一看照片，才知记忆有误，谈不上失望，反正，现实与印象擦肩而过，没碰上。赵利文的镜头下，还原了西安的寥落、粗陋，却也真切，充满平淡日子的温情。这些已经陌生了街道、建筑、装束，神情，让人觉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安，比印象中要远，比记忆里要近。

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安的书，不多。要寻觅过去的印迹，要研究城市的变迁，赵利文的照片，当然是最佳佐证。简·雅各布斯（Jane Jacobs）在她的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（*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*）里，对城市街区生活的研究，颠覆了我们对城市“应该什么样”“应该如何”的看法，与规划大师们思路相左，更与设计哲学背道而驰，对传统多元混合街区的重新发现，让我们重新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。遗憾的是，除了几张简易的街道平面示意图，书中竟无任何图像，对于一本研究城市的经典之作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瑕疵，当然，在美国，要真想给这本经典找到佐证，找到记录这些城市的照片，一点儿也不难。各个时代，各个城市，美国摄影师这种照片实在太多了。

如果你想了解西安，想研究这个城市，你就会发现，有关这个城市日常生活的照片很少，贾平凹曾感叹“老西安就是少有照片资料”，又说“没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”。虽然所指，主要是民国，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都是如此，系统性的照片资料，几乎没有。这也是赵利文这些照片的珍贵之处。图像，总能传递出文字所不能涵盖的讯息，我们展览前言里那句“希望呈现更多文字以外的东西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

六

赵利文跟家里人闹腾完，从工厂跑掉之后，一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无业游民，开过公司，办过杂志，拉广告，做印刷，与其他从事摄影的同龄人相比，赵利文身上，有着很明显的江湖气，这也给了他很强的生存能力，凭借出道早，混得久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活法，这种活法，虽然是二十世纪的，靠着惯性也一直维持到2007年。在那年，他解散了已经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小公司，回到了当年从厂里刚跑掉的状态，回到了原点：一个只想好好拍照的赵利文。

有人给“市井”这样定义：没有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忧患，更没有血与火的悲剧意识。赵利文一直就这么混在市井之间，在我看来，他仍然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，与二十年前并无不同。当年他在拍这些照片时，还不到二十岁，他的身份，